

## 理论探讨

#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进步”意识形态

潘亚玲

【摘要】自启蒙运动以来，“进步”作为一种信念，逐渐渗入到包括国际关系在内的人文科学。尽管冷战的结束证明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在追求“进步”上的失败，但作为意识形态工具的“进步”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却取得了“长足”进步：就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而言，它是这一学科本身及其内部等级划分的合法化证明；而就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所关注的外部世界而言，它又成为了“西方中心论”的合法化证明。正是这种“进步”意识形态的存在，使得打破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话语霸权显得异常必需与紧迫，使得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更显迫切。

【关键词】 确定性追求与进步；意识形态工具；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

【中图分类号】 D8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1755(2005)04-0043-49

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论述了“进步”观念自启蒙运动以来就成为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一大传统的问题，当时我也指出，这一传统正面临严峻的挑战。<sup>[1]</sup>具体而言，这种挑战就是冷战的结束。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虽然经过近一百年发展，但按照其诸派理论、或者事后来看将这些理论按其本身的逻辑充分展开，按照它们包含的所有潜在可能性来分析，都无法预见到苏联的突然瓦解，当然不是指预见到一定在哪一年哪一天和以什么具体方式瓦解，但它们确实无法大致地预见到在20世纪80、90年代之交苏联那种方式的急剧瓦解。所以对于绝大多数理论家来说，苏联的瓦解完全是一个“意外”(surprise)。<sup>[2]</sup>

尽管面临严峻挑战，“进步”观念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地位仍相当稳固，其原因在于：“进步”观念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有两大重要功能，其一是作为理论发展目标的“进步”，其二是作为意识形态工具的“进步”。目前的这一严峻挑战只针对作为理论目标的“进步”，而作为意识形态工具的“进步”观却取得了“长足”进展：就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而言，它是这一学科本身及其内部等级划分的合法化证明；而就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所关注的外部世界而言，它又成为了“西方中心论”

的合法化证明。正是这种“进步”意识形态的存在，使得打破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话语霸权显得异常必需与紧迫，使得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更显迫切。

### 一、确定性追求与“进步”观念

我们身处其中的世界处于一种变动不居的状态之中，偶然性与不确定性占有重要地位，这在全球化的今天就更为明显。罗西瑙认为，几个世纪以来规定国际体系中的要素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这个时代的动荡包括大量不确定和不可预知因素，它所包含的反常性就像气象学上的飓风和龙卷风一样。”<sup>[3]</sup>无论是冷战时代、稍长一些的“自由主义”和启蒙时代、或是更长一些的民族国家体系时代，我们可看到的都是不确定性在吞没现在和可预测的未来。霍布斯鲍姆慨言道，当世纪末的公民笼罩在迷雾之中、试探着迈向第三个千年时，所有人都肯定知道一个历史时代已经结束，但除此之外，他们几乎一无所知。<sup>[4]</sup>

美国著名哲学家杜威认为，生活在危险世界中的人不得不寻求安全，其途径有两种，一种是祈祷和虔诚，一种是劳动和艺术：前者通过改变自我而屈从环

境,后者则通过技术手段来改变环境。<sup>[5]</sup>这种对不确定性的恐惧及由此而来的对确定性的寻求,在十八世纪启蒙运动开始后、尤其是所谓“科学的观念”得以普及后变得益发强大。根据这一观念,在表面看来混乱多变的现象世界背后,有着一种可以说支配宇宙万物的规律,有着能够被发现、被理解、甚至被运用的原理或者原则。这一观念支配和改变了现代世界,其影响遍及几乎所有人类智慧所及领域。许多人由于支配自然世界的规则被发现,进而确信所有人类活动都必定有着类似的规律。<sup>[6]</sup>

这一迷信毫无例外地影响了二十世纪初新生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强调以历史哲学为主要研究方法的理想主义与经典现实主义仅统领这一学科不到半个世纪便遭到科学行为主义的强有力挑战。事实上,20世纪60年代爆发的第二次大争论并未涉及过多本体论层次的根本分歧,更多地涉及到认识论问题。<sup>[7]</sup>新兴的行为主义者依赖于实证主义的认识论,其观点是知识产生于我们的感官体验,来源于我们对周围世界的观察;它十分重视精确的、科学的方法,确定性追求在这里得到了极大体现。这与经典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所采用的形而上学方法形成了鲜明对比:形而上学在经验观察之外追溯知识的源泉,包含人类的理智、沉思、直觉和自省。<sup>[8]</sup>

尽管这一次大争论并不能证明科学行为主义与理想主义、经典现实主义何者更为“科学”、更为“进步”,事实上两者都以“进步”作为理论目标之一。<sup>[9]</sup>但这一次大争论仍有一种意识形态意义,因为自此以后,几乎所有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都更多地采纳貌似科学的手段,如各种统计方法、计算机技术的运用等。例如,瓦尔兹的新现实主义或者说结构现实主义就有着非常科学、进步的面貌。瓦尔兹首先引进了在其他学科中广泛应用的“结构”观念,将国际政治设想为一个独特的系统,是由一种结构和相互作用的单元组成的。<sup>[10]</sup>之后,他又将国际政治体系与经济市场相对比,认为,从根源上说这两者都是个人主义的,是自发产生的。在这种“依结果而进行选择的做法起作用的地方,不需任何人去组织系统的各个组成部分,也不需任何人不遗余力地维持,结构都会出现和延续下去。”<sup>[11]</sup>正因为大量采用了“科学”或“进步”的研究方法,瓦尔兹的著作享有“简练明晰”之誉。

然而,必须指出的是,当代大多数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家们所模仿的科学或进步观念并非当代自然科学所信奉的,而是经典自然科学、或者更准确的说是牛顿力

学之类的东西,与20世纪自然科学革命中所产生的那些新科学、新思想方法隔了整整一个时代。在今天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科学方法日益被人们所熟悉:假设必须进行检验;检验就要求进行试验,或用其它方法来收集数据。不管用哪种办法,必须尽力排除未知因素的影响,确保收集来的事实根据只同该假设有关。对收集来的数据进行仔细的观察、记录和分析后,才能决定是废弃、修改、重新制定或证实该假设。要公布研究发现,邀请其他人重复这一知识发现的过程,以便提出肯定或否定的意见。非常简单地说,这就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家通常所说的科学方法。这个过程的每一个阶段都强调思维和语言的准确性,强调严格区分什么是假设的和什么是可以经检验的。<sup>[12]</sup>这种方法的核心逻辑是:客观事物是复杂的(受多种因素制约),而人们总是通过简化复杂事物(考虑主要因素,舍弃次要因素)来认识的。

然而,20世纪下半叶的三大发现——1963年美国气象学家E·N·洛伦兹的混沌论、1965年数学家N·J·查布斯基和M·D·克鲁斯卡尔的孤立子、1975年数学家B·B·曼德勃罗特的分形论——使得线性化方法不再适用,而是更多地正视大量的不确定性、模糊性和偶然性。<sup>[13]</sup>由自然科学的这一革命而来的,当代社会思潮中“理性主义权威的弱化”也是一个不容忽视和不容回避的显著特征。《科学》杂志的特约撰稿人沃尔德罗普(M. Waldrop)对支配、改变世界理性的科学观念持批评态度。他认为,世界是复杂的,这种复杂性完全是道教式的:秩序不是天然固有的,“世界从一开始,一变成二、进而变成许许多多,许许多多又导致无穷无尽。”“复杂性理论不是基于牛顿式机械化预测的比喻,它似乎更接近于一棵树从树种长成参天大树的比喻,或者好比一个计算机程序从几行编码展开,甚至或许是一群头脑简单的鸟儿,有机而自组。”<sup>[14]</sup>诺贝尔奖得主普里高津也认为,人们认识世界的角度和方法应当超越牛顿思维的束缚,实现根本性的转变,即“转向多重性、暂时性和复杂性”。<sup>[15]</sup>

可以认为,正是因其根本上并未采用真正的“科学观”或“进步观”,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才会遭遇严峻挑战。其原因或许并不在于相对于现实而言,理论必须简化、抽象,因为如果不简化、不抽象、不撇开许多要素、不删除很多变量的话,现实就会复杂得你无法作理论抽象,或者说无法理论化,相应的预见能力会泡汤。<sup>[16]</sup>可以预见的是,过度的简单化只能导致对现实的理解出现更大的偏差,而这正是当前“进步观”遭遇

严峻挑战的根本原因。然而,西方国际关系学界并未试图放弃这一过时的“进步观”,相反它们还试图继续坚持,如民主和平论就是典型,它甚至将两次世界大战与其他非常小的战争等同,都量化为一场战争。<sup>[17]</sup>之所以如此,其根本原因在于,采用过时的“进步观”有着异常重大的意义:就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而言,它是这一学科本身及其内部等级划分的合法化证明;而就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所关注的外部世界而言,它又成为了“西方中心论”的合法化证明。这就涉及到“进步”观作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意识形态工具的功能。

## 二、“进步”意识形态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霸主地位

“进步”成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意识形态工具之一,首先源于一个现实问题:由于作为一门学科的国际关系并没有悠久的历史,因而也难说有悠久的理论传统,那么它的合法性何在?只有当国际关系理论家们证明,作为一门学科的国际关系有着悠久的历史与理论传统,国际关系作为一门学科才不致遭到怀疑。在此背景下,“进步”便成了国际关系学的合法性源泉。利用“进步”作为国际关系学的合法性说明,其目的在于创建一种对国际关系学科的认同。这种认同建构不仅需要建构学科本身的合法性,还需要在学科内部划分出高低等级。唯有这样,一门学科才具有合法性,才具有继续存在的理由。

建构一门学科的合法性,其核心工程是写成世人公认的学科史。学科史是一门学科的实践、进步与认同的核心部分。<sup>[18]</sup>对西方国际关系研究而言,这又包括两大方面:一是国际关系史,二是国际关系理论史。就国际关系史而言,因其本身更像是历史学家的工作,因而更容易达成一致。但要梳理出国际关系理论史的一个经典作家谱系却远为困难。尽管很多政治学理论家对国家间关系的问题进行过探讨,但通常情况下这些思想成果只是简单的“副产品”,而非专门的国际关系理论著述,如马基雅维利关于战争及均势的论述、康德对“持久和平”的讨论以及外交公函、政策建议、国际法条文、个人自传以及政治家和士兵的通信等。<sup>[19]</sup>

“进步”意识形态之于国际关系史建构中的体现即国际关系史是发展演化的,有着某种由低至高的发展轨迹。例如,K J 霍布斯蒂在对国际体系作分析时,就讨论了中国西周及春秋战国时期的国际体系、文艺复兴时斯的国际关系体系、19世纪欧洲国际关系体系以及当今的全球国际关系体系。<sup>[20]</sup>而以赫德利·布尔等

为代表的英国学派则从“国际社会”理论的角度,分析了国际社会的扩张过程,从而从“国际社会”角度对国际关系史进行了重新诠释。<sup>[21]</sup>由于前述原因,国际关系理论史的建构对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家们来说尤为重要。因此,克努成或许认为《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一书存在着重大失误,因为在其第一版中,该书仅用了1页的篇幅就介绍了修昔底德、马其雅利、克略西以及国际关系学科其他的奠基理论家,用了3页篇幅讨论了爱德华·卡尔,用了570页讨论20世纪的其他理论家。<sup>[22]</sup>这种对国际关系理论传统的“忽视”同样引起了其他理论家的注意,其中最为重要的当属马丁·怀特:他首先发出了“为什么没有国际关系理论”的诘问,认为以往的有关国际关系的思想都零散且不成系统。但他也指出,在国际关系理论中,有着三大传统且每一传统都可追溯至非常古老的思想家。<sup>[23]</sup>经过怀特的阐释,国际关系理论就有了非常久远的理论传统,西方国际关系作为一门学科的合法性问题也就得以解决。继怀特之后,众多理论家都试图根据某种框架,将自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降的政治思想家分别纳入某一理论传统,强化国际关系学的理论传统。<sup>[24]</sup>此外,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家还归纳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发展中的三次大争论,即理想主义对现实主义、行为主义对传统主义和新现实主义对新自由主义。在他们看来,每一次大争论都会促进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并强化国际关系学的合法性。<sup>[25]</sup>

在确立了国际关系学的合法性之后,作为意识形态工具的“进步”观还需建构学科内部的等级划分,即要区分出何种/些理论占据主导地位,而另外的只能居于从属地位。许多人反对将“进步”观念应用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因为(1)尽管自然科学展现了进步,但社会科学却没有实现这一点;或者(2)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没有展现真正的进步。但绝大多数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者仍乐于将“进步”应用于其研究中,导致这样的结果不仅仅是因为受到行为主义、实证主义及科学方法论的影响,还因为只有首先貌似科学,才会有可能被承认为科学。<sup>[26]</sup>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家们一直试图将皮尔斯、波普尔、拉卡托斯、库恩等科学哲学家们关于“进步”标准的论述应用于其学科中,认为在成熟的理论中,研究者所用的是共同的预先假定或范式,那些有着敌对流派并且以不同世界观为基础的范式前科学是没有发展成熟的理论。<sup>[27]</sup>

据此,由于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团体远比其他任何国家、地区的研究团体更为庞大,研究资金为丰

富、研究技术更为完善,各家各派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前提有着一定的共识<sup>[28]</sup>,因此美国国际关系理论是当今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领导者。而其他流派的国际理论由于与美国国际关系理论并不享有共同的基础,因而是不成熟的、较为低级的。例如,根据斯蒂夫·史密斯的研究,英国学派与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有着重大区别,而且远不具备美国式的“科学”面貌,所以就处于更低级的地位。<sup>[29]</sup>

无论从何种意义上说,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相对于其他研究的主导地位都类似于对拿破仑战争进行诠释的两大流派——约米尼对克劳塞维茨的关系。约米尼单纯的军事观点、思想方法的机械化、教条主义和简单化导致了对战争之固定不变的科学规律、法则的迷信,这至少在近二个世纪里深深植根于西方的军事思想意识中;与约米尼相反,克劳塞维茨的战争理论以博大、辩证而著称,但由此而来的克氏理论强调战争的复杂性、偶然性,使得其远不如约米尼理论那般“科学”、“简明”,因而也就导致其长期为人忽略。<sup>[30]</sup>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进步”观念不仅成为国际关系作为一门学科的合法性说明,也成了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的主导地位的合法性说明。

### 三、“进步”意识形态与文明标准

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而言,“进步”观不仅可使其作为学科存在、内部等级分野等合法化,还可强化其他学科中早已存在的“西方中心论”。自近代以来建立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基础上的西方文明,其发展速度与程度都要高于其他地区,其所导致最重要的思想后果之一便是“西方中心论”,认为西方的一切都是优越的,而其他地区的发展势必追随西方的模式,如果不那样,其结果便是无法进步。

“西方中心论”早已遭到了普遍的批评并为许多领域内的思想家所放弃,如普遍历史的观念就已被20世纪最深刻的思想家们尤其是海德格尔所否定;著名历史学家巴勒克拉夫也指出:“推进当代历史研究不仅在于集中批判欧洲中心论,而且还必须在其他方面付出同样巨大的努力去克服民族和种族的局限性,抛弃中心和边缘的观念……”<sup>[31]</sup>然而,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西方中心论仍占据重要位置。例如,克努成写作《国际关系理论史导论》的原始目的在于对抗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的统治地位,解构根据“进步”观念对西方国际关系内部的等级划分。然而如同作者自己所承认的,他这样做的时候却又陷入了欧洲中心主义。<sup>[32]</sup>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运用“进步”观念强化“西方中心论”的首要步骤是确立一个文明的标准。根据文明标准理论,社会变革的方向是单一、线性的,从原始状态到高级状态,人类演进的最终命运是注定的;在此基础上,“进步”便具有重要的伦理道德价值:朝向最后阶段的发展是“善”(good),因为这代表了进步(progress)、人道(humanity)以及文明(civilization),而后三个概念是根据与“西方中心论”相一致的方法来定义的。<sup>[33]</sup>

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史中,最为明显地体现这一思想的是所谓现代化理论。其著名代表、曾任美国国务院政策设计室主任的罗斯托就认为,变革的进程是简单的,所有社会都可处于经济成长的五阶段——传统社会、准备起飞阶段(Preconditions for take-off)、起飞阶段(take-off)、走向成熟社会阶段(the drive to maturity)、大众消费时代(mass consumption)——中的一个。<sup>[34]</sup>

尽管现代化理论早已不具重要地位,但文明标准逻辑仍然主导着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以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例,其对三种无政府状态的划分及其相互关系的论说也是这一逻辑的非常明确的体现。温特认为,无政府状态可以与不止一种逻辑相对应,也就是说国际社会并非只有一种无政府文化,而是可以有三种无政府文化的理想类型:即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这三种体系文化的构成是由行动者之间的角色结构决定的,国际体系中存在三种角色结构:敌人、对手和朋友;敌人角色建构霍布斯文化,竞争对手角色建构洛克文化,朋友角色建构康德文化。这三种文化存在着高低次序的排列:霍布斯文化最原始,康德文化最高级,洛克文化居间。温特说,“如果发生结构性变化,那么,这样的变化是朝着历史进步的方向发展的。”即,国际社会最终是会走向康德文化的。<sup>[35]</sup>

其他根据“进步”标准并不属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主流理论的学派,往往也同样反映了“西方中心论”,其标准也同样是“进步”逻辑,尽管其目标可能不如美国国际关系理论那么无所不包,如前述的英国学派的国际社会扩展理论就是典型。<sup>[36]</sup>

当然,根据这种社会达尔文式的进步观念,历史发展不仅应当有文明标准,还应当有一个最终目标,而且这一目标实际上都是目前最为先进、最为高级的社会模式。在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这一进步的终点就是西方、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美国式民主,其最大的理论体现是弗兰西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以及前几年一度甚嚣尘上的“民主和平论”。

“历史终结论”:20世纪80年代世界上发生的一系列重要政治事件并不仅仅是冷战的结束,更是历史自身的终结;历史的演进过程已走向完成,西方所谓的“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政治的最佳选择”,并即将成为“全人类的制度”。<sup>[37]</sup>“民主和平论”认为,民主国家很少、或从不相互打仗,其根源在于民主国家在政体上存在两个根本性限制因素:民主国家内公共舆论或国内政治机构的监督与平衡对政府决策存在很大的制约作用;民主国家之间有着相互尊重、合作与妥协的共同精神气质,使它们不会以战争或战争威胁手段解决彼此之间的纠纷。<sup>[38]</sup>因此,要实现世界的长久的和平、向更高级的阶段发展,最佳选择非民主莫属。<sup>[39]</sup>近段时间讨论较多的国家缔造(nation building)问题事实上就是从这一逻辑立论出发的。

与历史终结论和民主和平论相比,其他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或许其目的论没有那么明显,但完全不采取这种进步观念的理论既很少、又不占主流地位,其中较为典型的当属以沃勒斯坦为代表的世界体系论。该理论既否认社会阶段进化学说,也否认各文化间有什么本质上的差异;它认为人类历史是个整体,提倡从全球角度看历史,但同时反对“进步”观念;它把“世界体系”视为“中心”与“边缘”的对立结构,两者可能有道义上的善恶之别(“中心”不公正地压迫“边缘”),但没有进化顺序上的先进与落后之别。<sup>[40]</sup>与之相类似的还有依附论、霸权周期理论等进步色彩较为淡泊的理论。

然而,这些不取“标准的”进步观的理论,都既不能成为西方国际关系的显学,也不能对现实产生多大实际影响。相反,历史终结论、民主和平论等对美国的外交政策却有着非常明显的指导效果,自冷战结束以后美国在这些理论的指导下,大力在全球范围内推广民主与自由资本主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两次伊拉克战争都表明,美国似乎期望通过其实际努力,推动世界走向“民主”与“自由资本主义”这一“历史终点”。

#### 四、结论

世界是变动不居的,充满了多样性与不确定性;但或许正因为如此,它才充满了生机与活力。然而,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家们出于对不确定性的恐惧,试图通过依靠“进步”观念寻求一种确定性。如同尼布尔所说的,尽管以与进步思想紧密相联的“科学方法”阐释世界,使人们暂时可以回避“历史可以无尽创造但却无可挽回”这一事实,但由于人是一种动物这一简单事实就足以使这种对通过科学拯救世界的崇拜被戳穿。<sup>[41]</sup>

因此,“进步”成为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个意识形态工具,它一方面被用来为国际关系学科及学科内的等级分层作合法性说明,另一方面又被用来强化“西方中心论”和为美国对外行为作注脚。这也就是我们所见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现状,即打着“进步”的旗号,却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步,反而在冷战结束时纷纷落马。

国际关系总处于绝对的变革与相对的稳定之中,这意味着在新的模式形成并且深嵌于世界政治的日常议程之前,现存模式的磨损、秩序的减弱以及治理的停滞都是一种常态。<sup>[42]</sup>霍尔斯蒂指出,当代国际关系中存在着多种类型的变革,它们中有的可以用“进步”观念加以解释,有的却不能,新旧模式之间并不一定存在先进与落后的区别,而且如果强制性地以所谓“先进”替代“落后”,其后果可能是在实现“进步”的同时却“倒退”了。<sup>[43]</sup>因此,一味以“进步”作为理论发展的评判标准,其结果只能是今天格外明显的话语霸权现象,它往往导致的是一言堂与学科的停滞不前。就此而言,要终结目前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的“进步”意识形态,根本的解决方式在于破除这种话语霸权,倡导一种多中心的、平等的视角,真正地追求国际关系理论本身的进步,或许这就是呼吁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的根本理由。

#### [注释]

- [1] 参见潘亚玲、张春:《当代国际关系的传统与变革》(J),《国际论坛》2004年第1期。
- [2] John Lewis Gaddi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in Sean M. Lynn-Jones and Steven E. Miller eds., *The Cold War and After: Prospects for Peace*, expanded edition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94), p. 382.
- [3] James N. Rosenau, *Turbulence in World Politics: A Theory of Change and Continuit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10. [美]詹姆斯·N·罗西瑙:《没有政府的治理》(刘小林等译)(M),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页。
- [4] [美]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极端的年代:1914—1991》(郑明萱译)(M),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39—840页。
- [5] 参见[美]约翰·杜威:《确定性的寻求——关于知行关系的研究》(董世骏译)(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 [6] 时殷弘:《从拿破仑到越南战争——现代国际战略十一讲》(M),团结出版社,2003年,第56—57页;[美]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第五版,(阎学通、陈寒溪等译)(M),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50—51页。

- [7] Donald J. Puchala, "Woe to the Orphans of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 in Robert L. Rothstein ed., *The Evolution of Theor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olumbia: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1991), pp. 39-61.
- [8] [美]多尔蒂、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第五版[M],第39—41页。
- [9] 布尔曾指出,科学行为主义并不能算是国际关系理论的一种“进步”,因为科学行为主义者(1)过分相信科学手段所具有的解析与预测能力;(2)给不符合现实的抽象模型披上现实的外衣;(3)回避国际关系中的实质性问题,因为热衷于科学方法而无法把握问题的复杂性;(4)沉迷于定量方法,而无法考察现象在质上的重大差别。见 Hedley Bull, "International Theory: The Case for a Classical Approach," *World Politics*, XVIII (April 1966)。
- [10] Kenneth N. Waltz, "Political Structure," in Robert O. Keohane ed., *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88.
- [11] Waltz, "Reductionist and Systemic Theories," in *ibid.*, p. 67.
- [12] 同注[8],第50—51页。
- [13] 参见[美]E·N·洛伦兹:《混沌的本质》(刘式达等译)[M],气象出版社,1997年版;伊利亚·普利高津:《确定性的终结——时间、混沌与新自然法则》(湛敏译)[M],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8年。
- [14] [美]米歇尔·沃尔德罗普:《复杂——诞生于秩序与混沌边缘的科学》(陈玲译)[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引语分别见第464页,第462页。
- [15] 参见普利高津:《确定性的终结》。
- [16] 时殷弘:《从拿破仑到越南战争》,第14—15页。
- [17] 倪世雄等著:《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55页。
- [18] J. S. Dryzek and S. T. Leonard, "History and Discipline in Political Scienc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82 (1988), pp. 1245-1260; B. C. Schmidt, "The Historiography of Academic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20 (1994), pp. 353.
- [19] [挪威]托布约尔·克努成:《国际关系理论史导论》(余万里、何宗强译)[M],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页。
- [20] K. J. Holsti,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 3rd edition (Englewood Cliffs,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Inc., 1977), pp. 29-80.
- [21] Hedley Bull and Adam Watson eds., *The Expansion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4)。
- [22] [挪威]克努成:《国际关系理论史导论》,第1页,脚注[1]。这一情况在《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的第5版中并没有得到改变。
- [23] Martin Wight, "Why is There No International Theory?" in Herbert Butterfield and Martin Wight eds., *Diplomatic Investigations: Essays in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Pp. 17-35; Martin Wight, *International Theory: The Three Traditions*, edited by Gabriele Wight and Hedley Bull, (Leicester and London: 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1)。
- [24] 这方面的书相当多,如 Michael W. Doyle, *Ways of War and Peace: Realism, Liberalism, and Socialism* (New York and London: W. W. Norton & Company, 1997); Butterfield and Wight eds., *Diplomatic Investigations*; Kenneth W. Thomson, *Fathers of International Thought: The Legacy of Political Theory* (Baton Rouge: Louisiana Press, 1994); James Der Derian ed., *International Theory: Critical Investigations*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95); Paul R. Viotti, and Mark V. Kauppi,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Realism, Pluralism, Globalism* (New York: Macmillan Publishing Co., 1987); John A. Vasquez, ed., *Classic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nd edition* (Englewood, N. J.: Prentice-Hall, 1990); 等等。
- [25] Cameron G. Thies, "Progress, History and Identit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The Case of the Idealist-Realist Debate,"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8, No. 2 (2002), pp. 147-185.
- [26] Fred Chernoff, "The Study of Democratic Peace and Progres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6 (2004), pp. 50-52.
- [27] Cameron G. Thies, "Progress, History and Identit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Fred Chernoff, "The Study of Democratic Peace and Progres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6 (2004)。
- [28] 这种共识体现为:大都以国际无政府状态为研究起点,大都采用行为主义、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或者用秦亚青的话说是,理论框架趋同、世界观趋同、认识论趋同以及研究方法趋同。参见[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译者前言”,第12—13页。
- [29] 这些区别有:(1)英国强调传统分析,美国强调比较分析;(2)英国强调规范方法,美国强调实证方法;(3)英国注重历史分析,美国注重科学分析;(4)英国注重国际关系中的独特性和行为的个人特点,美国注重国际关系中的普遍性和一般规律;(5)英国认为“本能”、“直觉”和“想象”大于“前提”、“推论”和“假设”,美国反之;……(7)英国重视个人、伟人和精英集团的作用,美国不如英国重视;等等。参见颜声毅主编:《当代国际关系》[M],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65—366页。
- [30] 有关约米尼与克劳塞维茨的战争理论的对比及其相互关系,可参见时殷弘:《从拿破仑到越南战争》,第3、4章;Pe-

- ter Paret ed., *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 From Machiavelli to the Nuclear Age*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6), Chaps. "Jomini" and "Clausewitz"; Raymond Aron, *Clausewitz: Philosopher of War*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Inc., 1983), Chap. 9.
- [31] [英]杰弗里·巴斯卡拉夫:《当代史导论》(张广勇、张宇宏译) [M],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第34页。
- [32] [挪威]克努成:《国际关系理论史导论》[M],“中译本序”,第2页。
- [33] Brett Bowden, "In the Name of Progress and Peace: The 'Standard of Civilization' and the Universalizing Project," *Alternatives*, Vol. 29 (2004), pp. 43-68; Gerrit W. Gong, *The Standard of "Civilization"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Oxford: Clarendon, 1984).
- [34] W. W. Rostow, *The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 A Non-Communist Manifesto*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0), Chapter 2, "The Five Stages of Growth-A Summary," pp. 4-16.
- [35] [美]温特著:《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六章,引语见第387页。
- [36] Hedley Bull and Adam Watson eds., *The Expansion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Gong, *The Standard of "Civilization"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 [37] 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The National Interest*, No. 16 (Summer 1989), pp. 3-18; [美]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之人》(黄胜强、许铭原译) [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 [38] 民主和平论的文献相当多,被引用最多的文献当属多伊尔的两篇论文,See Michael Doyle, "Kant, Liberal Legacies, and Foreign Affairs, 1 and 2," *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 Vol. 12, Nos. 3 and 4 (Summer and Fall 1983); and Michael Doyle, "Kant: Liberalism and World Politic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80, No. 4 (December 1986), pp. 1151-1169.
- [39] Fred Chernoff, "The Study of Democratic Peace and Progres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 49-77.
- [40] See Thomas R. Shannon, *An Introduction to the World-system Perspective*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89).
- [41] [美]莱茵霍尔德·尼布尔:《道德的人与不道德的社会》(阮炜等译) [M],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 [42] [美]詹姆斯·N·罗西瑙:《没有政府的治理》(刘小林等译) [M],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页。
- [43] K. J. Holsti, "The Problem of Chang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Working Paper No. 26* (December 1998), pp. 7-9.

作者简介:潘亚玲,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2004级博士生。(上海,200433)

收稿日期:2005-04-18

修改日期:2005-05-19

---

S. Kashmir policy will focus on maintaining status quo in South Asia and prevent turbulence resulting from a large-scale war between India and Pakistan. The U. S. will also try its best to promote India and Pakistan to resolve this issue by themselves through bilateral negotiation.

27 **Anglo-American Relationship in the Vietnam War**

by Zhang Ying

Vietnam War was the severest test that the United States met during the Cold War Period. In order to internationalize the war, the United States asked its most important ally Britain to send troops to Vietnam. But Britain turned down the United States' request, dissociated itself from the bombing policy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insisted on mediating solving the issue through negotiation. The divergence and contradiction between Britain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Vietnam War cast a shadow on Anglo-American special relationship.

Theoretical Probe

33 **Realists' Misinterpretation in the First Debate and Its Disciplinary Significance**

by Chen Yudan

There have appeared several debates in the history of IRT. The first debate is generally said to happen between Idealism and Realism in the period around World War II. Through this debate Realism established its disciplinary position and was viewed as a progress in IRT. However, this debate was a one-sided debate and, to a large extent, was led and constructed by the Realists. In the debate, the Realists made a series of misinterpretation. Through the misinterpretation of Idealist tradition, of Realist tradition and of Idealist IRT, Realism proved its own superiority and scientific nature, as well as forming a disciplinary identity.

38 **An Analysis of the Concept of Small States in Wester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by Fang Junxiang & Li Bo

The research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s dominated by realist analysis paradigm at all time. Great powers play the main role in international system, and small states are affiliated with them. In a lot of positivist and empirical research, it is obvious that great powers hold the right of theoretical discourse and small states are marginalized. This paper aims at the concept of small states which are generally neglected by academia. Undoubtedly, clarification of the defini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small states in western international theory is conducive for us to understand such a group of actor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43 **The Ideology of Progress in Wester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ies**

by Pan Yaling

Since the Enlightenment, progress as an ideal has been stepped into the study of human science, includ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end of cold war proved that the wester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ies had failed to pursue progress. But the idea of progress has become a tool of legitimacy; to legitimate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s a discipline and western domination of the theory. Therefore,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with Chinese character is under great pressure.

Chinese Diplomacy

50 **The Influence of Taiwan Issue on Sino-American Relations in the First Term of Bush Administration**

by Li Baojun & Fang Bohua

In the first term of Bush Administration (Jan. 2001—Jan. 2005), the Sino-American relations experienced great upheavals. The changes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stages. This paper gives us a deepened analysis on the process, characteristics, and reasons of the evolution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 in the first term of Bush administration, and then discusses the tendency of Bush administration's China policy and the future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